

引 言

在中国古代史上，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这是继夏、商、西周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其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社会形态大转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与封建社会的形成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也是国家从分割状态走向整合统一的历史阶段，又是中华文化全面奠定基础 and 杰出人物辈出的轴心时代。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他生逢春秋初期，适应奴隶社会开始瓦解的时代要求，曾经相齐桓公 40 余年，精心设计和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开创性改革，使齐国富庶强大起来，率先确立了它在春秋前期的霸主地位。随着大国争霸的开始和加剧，东周王权日益衰微，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再也不能对各诸侯国发号施令，却转而依赖于诸侯大国苟延残喘。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分期，我国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西周时期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是为封建制度的诞生开辟道路的，他所致力的改革是进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周时期是农奴制社会，那时是属于封建领主时期，管仲的改革是把一个农奴制社会推进到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前一种划分法以郭沫若学派为主要代表，本书采用这一观点。后一种划分法以范文澜学派为主要代表。两个学派都有能够自圆其说的论据和相应的历史与考古依据，因而在历史学界，长期以来是两说并存的。但是，两说对管仲改革的进步性，在评价上都是肯定的，而前一说对管仲的肯定要更高一些。因为前者认为管仲的改革是两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开端，而后者则认为是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转变。当然还有其他的历史分期观，评价又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古史分期论，对管仲这个历史人物和他所进行的事业，大都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自古以来，管仲是一个没有重大争议的人物。

管仲的改革为地主封建制在齐国的确立开了一个好头，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但由于地主封建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中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过程，所以管仲所进行的改革，还没有达到最终完成封建制确立的阶段，只是一个伟大的开端。直到战国初期，

齐国经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进入到地主封建制确立阶段。这就决定了管仲思想和齐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致性，从而使管仲思想在齐国封建制确立全过程中占有崇高地位。因此以管仲的名字命名的《管子》一书，既保留着管仲思想脉络的中心地位和重要资料，又汇集了不少后期齐国改革中的思想资源和不同学派的智慧，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齐国和管仲以及后期齐国学术思想的一部宝典。

一 雄踞东方的封国——齐

在今天山东这片热土上，早在周代初期周公东征以后，便建立了多个封国，其中以齐国和鲁国最大，分处于泰山的北部与南部。在泰山西面崇山峻岭的峡谷中，有一条要道沟通齐鲁，那里有一个村庄叫界首，就是古齐鲁的一处分界要塞，至今犹存。

（一）在周天子分封中诞生了齐国

齐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和分封制的兴起与没落以及两周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巩固疆域广阔的奴隶制国家，实行了分封制。天下的臣民土地都属于周天子所有，周天子按照亲疏远近、等级差别和立国时的功劳大小，把王畿（京都地区）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各个大小同姓诸侯和有功的异姓诸侯。对于灭其国而能归服的异族，特许不绝其祀，也给予分

封立国，如把殷王朝灭国后归顺周天子的后裔封于宋。当时的诸侯国都是诸侯食禄屏藩的领地和政权，他们都共同拥戴周天子的统治，负责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诸侯有向天子纳贡（交纳贡品）、随从作战、定期朝见的义务。周王对叛周的诸侯拥有收封灭国的大权。

这是周王朝建立的分封制大一统国家体制。据历史记载，周初封邦建国四百余个，商朝归服过来的方国也有八百多个。姜太公、周公和召公为周朝的三公，都在立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周天子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封召公于燕，三公的封国在当时的众多封国中都具有显赫地位。齐鲁都是立国最早的诸侯国。

（二）齐国发展中第一个辉煌时期

太公姜尚受封于齐之初，地处山东半岛的中部，方圆不过百里，尚未扩展到半岛全部滨海区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既存在殷旧贵族的反抗势力，又面临着半岛原住民莱夷势力的侵扰。在太公受封之初，就曾经发生过莱侯率兵同太公争夺封地之都营丘的事。这说明太公来到齐地立国，一开始是遭遇到当地势力反抗的，但凭着太公深邃的谋略和雄厚的军事实力，击退莱夷争国和镇抚殷遗民的反抗是不成问题

的。可是太公并没有把军事上的占领和控制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也没有把莱夷土著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是采取了如同他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开国时安民强国的相近政略。他鉴于殷末纣王讨伐东夷所引起夷人的反抗和不满，便采取了简其礼、从其俗、举贤尚功，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方针，因地制宜，简政近民，既怀柔了东夷族，又震慑住殷人的反抗，很快就收到了成效，使国家获得平治，民众得到实惠，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齐国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国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夷人，半岛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从未得到开发和充分利用，长期存在着土地贫瘠、农田荒芜、人烟稀少的状况。太公实行了恩威并用、富国安民和发展生产的政策，逐步推行了井田制，坚持轻徭薄赋、不误农时，迅速使农业得到发展。在加强农业的同时，他又重视了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充分利用近海的便利条件，大力开发渔业和制盐业，不仅稳定了齐国的政局，也振兴了齐国的经济。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人口随之增加，在列国间声威大震，远处的民众也投奔而来。随着齐国实力的壮大，逐渐吞并了周围一些地域和小国，大大拓展了齐国的疆域。这是齐国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鲁国在建国之初所采取的不同方

略。周公东征取得胜利后，成王为褒奖周公之德，将商奄（今曲阜）这块著名的“少昊之墟”，封给了周公儿子伯禽，命为鲁国。在众多封国中，鲁国所受封赏是最为丰厚的，既有配享“天子礼乐”的典章制度和贵胄仪仗、礼器文物，又分配给“殷民六族”，作为其统率与监管的民人，这就必然要求鲁国完全用命周制，俨然成为宗周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成为周王朝统辖下推行周制的模范区。伯禽到达奄地后，自然意识到鲁国所肩负的重任，便根据周制从根本上变革与改造了当地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人情，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尊尊而亲亲和重农耕的一套战略方针，以至于春秋时期仍保持着“周礼尽在鲁”的格局。由于齐鲁在奉行周制方面、对待当地礼俗的变革所采取的方针和因循的程度有很大差别，致使两个封国在后续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的格局和结果。齐国采取农工商并重的政策，又得渔盐之利，贸易比较发达，经济比较开放，开创了一代海滨文明。鲁国地处丘陵，内陆特点突出，长期实行注重农业经济发展，关市管理严格，虽贸易不够发达，民风比较淳厚朴实，却能在内陆环境中开创典型性的农耕文明。这样就使齐鲁分别代表着古代中国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据《史记》记载，周公曾在封国之初，对齐国五个月报政完成建国和鲁国三年才报政完成建国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感慨。在他看来，前者太疾，而后者太

迟。一疾一迟，表明了齐鲁在政治上对当地的改造深度不同，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因顺民情上的区别。齐国实行了简易之政，鲁国实行了繁难之政，不同的施政基础对其后世的发展必定会产生长久的影响。因此周公当时就预感到鲁国必将“北面事齐矣”，就是说鲁国将要受制于齐国了。但是另一些史家从两国建国方针的不同，借周公之口又说出了另一番道理来。例如在《汉书》和《说苑》中记载，周公从齐国实行了“尊贤尚功”而预见到齐国只能传五世，因为不问亲疏地选用贤人和论功行赏，可能会被某种假相所欺蒙，因而周公预感到齐国将会出现“篡杀之臣”。果然在春秋末年有“陈恒弑其君”的事件发生，似乎周公的预见得到了证明。《汉书》还说到周公从鲁国实行“尊尊而亲亲”，预见到“鲁之泽及十世”，借此说明鲁国实行的是王道政治，而齐国实行的是霸道政治，王道优于霸道。由此说明鲁国能够产生儒家学说不是偶然的。这些论说，显然是属于崇儒的史学家依据齐鲁发展的史实加以解说罢了。

王道与霸道两种政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进行过长期的较量。终战国之世，是秦的霸道统一了六国，而奉行王道的政治主张，始终是被作为一种良好的政治愿望流传着。秦朝二世而亡，是作为史证以表明霸道终究是短命的。但到了汉家天下，在接受秦鉴的同时，依然并不纯任王道，而是将“霸王道杂之”

作为汉制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要把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结合起来、同时并举与交替使用。这是对所谓“王霸之辨”的一个实际的政治概括，它成为后来封建社会长期遵循的一个政治模式。

（三）齐国发展中第二个辉煌时期

进入春秋时期，各个封国之间由于铁器工具和牛耕的使用，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各国都出现了辟草莱、开荒地的情况，许多荒滩野岭被开垦成良田，耕作技术由刀耕火种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随着私田增加，井田制由废弛而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演变。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在此期间，齐国率先实行了根据耕地土质和水利条件的级差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赋税，鲁国也实行了按田亩多少征收田税的政策。这样做可以使封国公室和大夫采邑的财政收入增加，扩充其经济来源。这种社会根基的变化，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诸侯国之间土地兼并战争。这时的齐国和鲁国都在吞并其他小封国的过程中壮大自己。据历史记载，单说齐国就先后吞并了 35 个小国。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于史书的有 170 多个，然而能够参加诸侯会盟、征伐有事迹可考的，直到春秋后期已经

只剩下齐、鲁、晋、宋、郑、楚、秦、蔡、卫、陈、吴、越、杞、许、曹等十几个大些的封国了，其余的封国大都或沦为附国、或已被并灭。这时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十分微弱，渐渐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强大的诸侯，不再对周王室唯命是从，王室内乱不止，王纲懈怠，诸侯国对王室不仅轻慢有加，而且敢于兵戎相凌。周桓王十二年（前 708），周桓王带领军队去讨伐桀骜不驯的郑国，郑伯不仅敢于率兵抵抗，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封国强于王室的现实，已经成为无法挽回之势。这时在诸侯国之间出现了近百年的争霸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凭借其实力，用战争来扩张领土，迫使弱小国家听命其号令，并展开激烈的相互争夺，在剧烈动荡中完成着区域性整合，为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据史书记载，春秋 242 年间，有 36 名君主被杀，52 个诸侯国被灭，发生大小战事 480 多起，平均每年有两起。

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认为称霸的有八位，又加上了郑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显示出当时争霸成风已成为时代特征。频繁的争霸战争，无疑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客观上却起着催生新社会制度的作用。

管仲和齐桓公最先意识到这一时代的动向，矢志把握先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上进行改

革，富国强兵，振奋民心，适时地在列国之间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口号，多次促成在齐国主持下会盟各国诸侯，举兵抵御外族入侵，在拥戴周天子的旗帜下号令各方诸侯，调整列国关系，捍卫中原文化不受摧残，形成了以齐为核心的中原诸夏联盟，扩大了华夏文明圈，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齐国第二个辉煌时期。

（四）齐国发展中第三个辉煌时期

进入战国时期，各大国又有新的分化起落。周天子缩居在洛邑“王畿”这块号称“宗周”的窄小地域上，再也管不了天下的事了。“尊王攘夷”早已成为昔日黄花，被丢弃脑后。东周之路还没有走到尽头，周天子先行告退。公元前 256 年周赧王被秦所灭，有周一代戛然而止。但战国的烽火正炽，在它延烧的二百六十多年中，驰骋疆场、争逐天下的已经是“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了。当时宋国和鲁国虽然也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经十分衰弱，不能跻身于八雄或九雄之中了。最后经商鞅变法迅速崛起的秦国战胜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

有周以来，齐立国最早，灭国最晚，存国最久。

在战国风云中，齐国始终是参与争逐的主角。

齐国的姜氏政权，到了齐简公四年（前 481），被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田氏，即从陈国逃奔到齐国的陈氏家族后裔所取代。先是陈恒（又名田常）发动政变，杀死了国君齐简公，自任为齐相，一改旧贵族那种公室奢侈、重赋厚税的体制，积极争取民心，姜氏齐国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在鲁国发生了“三分公室”，鲁君的政权和财富被国中的季、孟、叔三家大夫所瓜分，后来又演进为“四分公室”，季氏有其二。晋国发生了“三家分晋”，原来的晋国分化为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些重大事件的相继发生，被历史学家作为春秋时期结束与战国时期开始的分界线。

田氏夺取到齐国政权后，没有马上做齐国的国君，经过了 90 年的过渡，直到公元前 391 年才由田和把沉湎于酒色的姜姓齐康公放逐到海岛上，自己做了国君。但是这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周王室的承认，直到公元前 386 年，田和才被周王室正式追认为齐侯，这是在体制上齐国由姜齐转变为田齐的开始。

田齐的出现，是新兴封建制度在齐国取得胜利的标志。到了战国中后期，齐国继续得到发展，在齐威王时期达到了鼎盛，后来在齐愍王时一度 and 强秦并称为“二帝”，秦国为西帝，齐国为东帝，形成了二虎相争的局面。不久愍王出于策略的考虑，主动撤销了帝号，随后秦国也放弃了帝号。在田齐的初期，齐国

又出现了一个齐桓公，大概是为了唤起齐国再度称霸的雄心。这位新的齐桓公就是田午，他在位期间（前374—前357），开始建立起举世闻名的稷下学宫，授予大夫以尊宠称号和优厚待遇，招纳天下贤人学者汇聚于此，不从政而议论国事，开了一代“百家争鸣”之新风。稷下学在田齐威王和宣王时期达到了鼎盛，前后存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这期间是齐国第三个辉煌时期。

稷下学的兴起反映了新兴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渴求和新统治者为适应新时代治国的需要，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雄才大略的风度。为了开放言路，广揽贤人，齐威王接受宰相邹忌的进谏，向全国臣民下令：凡是能当面批评我（威王）的人，受上赏；上书向我进谏的人，受中赏；能够“谤议于市朝”让我听到的人，受下赏。这位君王的政治大度，竟能达到这般地步，只要你骂得有理，他也乐意听取。因为你没有勇气或者没有适当的途径，不能做到“当面刺寡人之过”的，只能受到下赏。由此可以想见稷下学宫的创建，倡导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真正意图，在于求贤纳谏与励精图治。这种格调很高的政治风范，史所罕见，不仅使齐国步入了辉煌时期，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管子》一书就是齐国在姜齐和田齐两个时代智慧的结晶和总汇。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在后面详细谈到。

(五)齐国能够开创强盛局面的启示

首先，齐国能够开创如此强盛的局面，和它在建国之初实行发展生产、因地制宜、依顺民俗、怀柔安民的战略方针分不开。从太公建国、桓管改革到田齐变法，都保持了这个传统，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精神。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民心是政治的基础。有了这两个基础，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够富强，军事上才能所向无敌。

其次，齐国能够开创如此强盛的局面，和它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社会改革分不开。第一次是姜齐时期管仲相齐桓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民富国强、称霸诸侯，为新兴封建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是田齐时期几代君相连续进行的变法，使齐国率先确立了新兴封建制度。值得称道的是这两次改革保持了内在的连续性，并没有因为齐国的政权由田氏取代了姜氏，而使这场封建性改革内在连续性产生分割和中断。而且，第二次改革又进一步积累、继承、深化和发展了第一次改革的成果，并加以完成。这是管仲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齐国前后期都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这也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好的先例和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完成一场大的社会转型性的变革，必须靠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最

终达到目的，不能因为权力易手、政权更迭而有所分割和中断。历史事实证明，齐国的姜氏政权在齐桓公以后日趋腐败，统治集团内乱不止，已经失去了持续进行改革的主观条件。而田氏长期采取的勤勉节俭、薄敛厚施策略，日益获得民心，出现了民归之如流水的局面。姜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是对深化改革的有力促进。

其三，齐国能够开创如此强盛的局面，和田齐在政治文化与思想上能够广开言路、积聚精英、提倡和尊重百家争鸣的国策分不开。稷下学宫创办了近一个半世纪，来到稷下学习、讲学和交流的人何止百千，使齐国在思想和人才方面形成优势，极大地推动了列国养士的潮流。来到齐国做稷下先生的大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思想家，齐国的强盛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层面，是得到了众多知识精英的智力服务和智慧支持的。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最后，自我孤立、放弃抵抗是齐灭国的教训。齐国于公元前 221 年终为秦国所灭，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不够先进，也不是由于它在思想文化上过于开放民主，而是由于后期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好的制度要靠有远见的人来维护，好的传统要靠坚强的后代来传承。当时齐王建年幼，不得不仰赖固执短见的太后执掌国柄，但她在对待列国之间的关系上犯有战略

性错误。她长期在合纵连横间摇摆不定，以后干脆被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所俘获，实行了隔岸观火、不修战备、自我孤立、苟且偷安的“鸵鸟策略”，使秦国得以长趋东进，特别是齐国在同燕国与宋国无谓的火并中耗尽了国力，以致在秦国战胜了其他五国兵临国境时，完全失去了抗秦自保的能力。巍巍齐国，不得不臣服于秦。

二 辅弼霸业的名相——管仲

管仲（？—前 645），春秋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名夷吾，字仲，亦称敬仲，生年不详，姬姓贵族后裔，在传世中败落下来，幼年时家境贫寒。据管仲回忆往事时说，他的一生和鲍叔牙紧密联系在一起。年轻时，他就和鲍叔牙是好友，他们合伙经商，获利后他总比鲍叔牙多拿一些红利，伙计们都看不惯，而鲍叔牙却解释说：他家贫，多拿一点是应该的。管仲和鲍叔牙曾经一起打过仗，管仲常常躲在后面，不肯冲锋在前，退却时却跑得很快，士兵们对他很不满，认为他怯懦，鲍叔牙为他解释说：管仲不肯拼命是因为家有老母，他一旦战死，就没人奉养。后来管仲也曾经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一些人耻笑他愚笨，鲍叔牙向众人解释说：管仲并不是干不了，只是这些小事并不适合他的才能罢啦！这些事实深深感动了管仲，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中国成语中有句“管鲍之交”，赞扬的就